

金齏玉脍

孟晖

白如雪,而伴以“橙齏”。孟郊《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枋口柳溪》表达更有神采:“灵味荐飏瓣,金花屑橙齏。”到了宋代,以橙肉泥为鱼脍调味,成了文雅阶层的通行做法,于是,诗人们纷纷在作品中随笔提到,如黄庭坚《谢荣绪惠鲜鲫》:“薑白方看金作屑,脍盘已见雪成堆。”陆游《夏日》:“未说盘堆玉脍,且看白捣金齏。”只要切脍,同时就一定要捣橙肉做齏,两项厨艺是联动的,所以宋人写诗时就自然地一并提及。

橙肉泥灿黄如金,洒在脍盘上有如“金花”,完全符合“金齏”的定义,因此文人们便直接以金齏呼之,苏轼《破阵子》便道“金齏新捣橙香”。橙齏如金,鱼脍如玉,二者拌在一起,黄澄白润,非常的养眼,由此构成“金齏玉脍”的清雅新版本。

明人撰写的《食物本草》中介绍橙的优点为:“或作酱醋及和五味,入鱼肉菜中,食甚香美,且杀虫、鱼毒。”显然,在中国饮食史上,香橙所承担的角色,恰恰近似于今日西餐中的柠檬——橙肉可以与酱、醋等各种调料调在一起,拌入鱼或肉中的菜肴中,靠果香去除腥气,让口感更好。古人还相信,橙子的酸汁可以杀死鱼、肉中的寄生虫,并去除鱼肉中所含的毒素。

说来真让人惊奇啊,古代中国人吃鱼生的方式,与今天真的相去不远!今天要用柠檬,唐宋元三代则是用鲜橙肉。吴文英做《虞美人影》词一首“咏香橙”时,特意提到了橙子的此一著名用途:“黄苞先着风霜劲,独占一年佳景。点点吴盐雪凝,玉铉和齏冷。”

文人们不仅喜欢在笔下谈吃,还喜欢描写厨艺的要点,结果是留下了彼时做橙齏的具体方式——把橙肉放在白子里,用杵子捣成泥,再加细盐调匀。鱼肉生吃,最重要的就是一个鲜字,因此,以带汁橙泥的酸酸果香,再渗以淡淡的盐味,来突出生鱼的清腴口感,自然是最佳方案。

在宋人那里,不仅鱼脍,其他如虾、蟹等海鲜、海鲜都以橙泥佐味为佳。据《武林旧事》,南宋绍兴二十一年,高宗赵构临幸宠臣张俊的郡王府第,张俊则排出了盛大气派的“供进御筵”,其中有一道菜名为“虾橙脍”,推测起来,是用生虾做脍,还用鲜橙调味。《梦粱录》则记载南宋临安的分茶酒店“即餐厅里提供的菜色包括“橙醋赤蟹、白蟹”“橙醋洗手蟹”“橙醋甜”。

另外,相传为宋人林洪所著的《山家清供》中,“持蟹供”一节说:“此物风雅,但橙、醋自足,以发挥其所蕴也。”——螃蟹是雅物,所以仅仅用橙齏、醋做蘸料就够了,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最好地品尝到螃蟹的原味。实际上,元末四大画家之一的倪瓒,不仅画作中意境高绝,同时也是文人幽雅生活方式的代表。在他所留下的《云林堂饮食制度集》中,就详细介绍了吃蟹的方式:“用生姜、紫苏、桂皮、盐同煮。大火沸透便翻,再一火沸透便咬。凡煮蟹,旋煮旋咬则佳。以一人为一为,只可煮二只,咬已再煮。”

说得非常清楚,煮蟹的水中要事先放入生姜、紫苏、桂皮、盐,由此来给蟹肉添味。但在食蟹的时候,则仅仅用橙齏、醋为蘸料。

明清时期,吃鱼生的习惯在大部分地区都消失了,只保留在福建与两广地区,用橙肉泥为河鲜、海鲜佐味的清雅也一并遗忘,结果,人们对金齏玉脍的印象也就模糊起来,搞不清当初究竟是怎样的美味。

古人曾经何等爱吃鱼脍,从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就可以看出来。那部宝藏之书在《和齏》一节里提示了“脍鱼脍”即切脍的技术要点,在其前,则用很长篇幅详细介绍“脍齏”的做法,包括所需的蒜、姜如何处理都仔仔细细交代,唯恐差了口味。正是在这一节里言道:

“熟栗黄:谚曰‘金齏玉脍(脍)’,橘皮多则不美,故加栗黄,取其金色,又益味甜。”

原来,南北朝时的脍齏靠橘皮调味,同时还会添入适量的熟栗肉,栗肉茸可以给予甜味,同时和橘皮一起使齏泥呈金色。而如此做成的齏泥,即为“金齏”。

《齐民要术》推荐的“金齏”成分复杂,制作极细致,大致是先把白梅(盐腌再晒干的梅子)、姜、橘皮舂成末,取出放到一旁,再舂熟栗子肉与糯米饭,直舂成泥茸,然后先后下生蒜和烫过的蒜,一起舂捣成泥;接着下盐春打,打到起沫的程度,把梅、姜、橘的混合粉末倒下,春打均匀。最后一步则是倒入醋,搅拌均匀。

如此制成的金齏,梅、蒜、姜、橘、栗、盐、醋的滋味掺和到一起,配生鱼肉,应该不错。书中强调“脍齏必须浓”,所以加入少量白米饭以加强其浓稠度,而成品是耐心舂打成的混合酱泥,装盘时铺在鱼脍上,由此形成“金齏玉脍”。食客则是就着那酸咸里微微透着辣又带一丝栗子甜的细茸吃下腴嫩的生鱼肉丝,想来确乎是天下至味。

不过,到唐代,随着脍齏配方的改进,金齏玉脍升上了新的境界:

“唐人鱼脍以细葱,金橙拌之,号曰金齏(齏)玉脍。”(明陈耀文《天中记》)

在唐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水果——橙子,对唐宋两朝的雅文化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其中之一便是,唐代士大夫改用橙肉泥作为鱼脍的调味伴侣,还给出了个专称“橙齏”。陆游就有《雨中小酌》一诗自述,“晨起占云日日西,吾庐烟雨正凄迷”,在连日阴雨的日子里,“前村着屐履通路,自摘金橙捣齏齏”,通向边村的小路虽然变得泥泞,但穿上木屐倒还是能走过去,反正雨天里闲着也是闲着,大诗人便亲自穿着屐子前去摘成熟的橙果,带回家捣成果泥,作为脍齏,美美吃一顿鱼脍。

以橙齏佐脍,是在唐代形成的吃法,王昌龄《送程六》一诗就有句云:“青鱼雪落橙齏。”说青鱼的脍丝银

本文所记的五位老先生,舒芜先生生于1922年,卒于2009年;其他四位先生生于上世纪一〇年代,谢世于上世纪末,冥寿悉已过百。

一九八三年,是我在南开大学中文系读研的第二年,彼时的南开中文系只有三名教授,还没有资格独立评审晋升正教授。系里拟提拔几位副教授升职,遂印制资料,委派讲师李剑国赴京拜谒几位同行专家审核鉴定。李剑国是我的师兄,长我八岁,山西灵丘人,一九八二年研究生毕业留校。因为他不熟悉北京的道路交通,而我只是个老北京人,故系领导命我陪同前往。

正是初冬的十一月下旬,那天近午,我们俩在北京站下了火车,考虑到距离建国门外的社科院不远,而鉴定专家有文学所的范宁先生,便步行前往路南的社科院宿舍。事有凑巧,行至社科院对面的路边,恰遇范宁先生独步而来。范先生是李剑国硕士论文答辩的主持,故晤面颇为亲切。我俩呈上南开某副教授的资料,范先生略事翻阅,即娓娓言道:这位先生我很熟悉,他的研究主要是搜集罗列资料,但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相关的论述,我认为还不适合晋升教授。

范先生谈了约三分钟,我们便在路边分袂。寒舍在建国门内,距此不过一箭之地。便与剑国兄同至家中见了母亲,草草午膳。旋即乘公交至海淀北京大学拜谒周祖谟教授,周教授是鼎鼎大名的语言学家,还是我叔父陶庵(1946年人辅仁大学国文系)的老师。不过那个年代电话尚属稀有之物,大学教授家里也没有电话。系里只是给了我们需要拜访的各位专家的居处地址,我俩循此先入北大中文系院内,询问燕南园方位,乃出校门,择路寻访。很快便步入了一个小区,即燕南园,乃北大教职工宿舍集中地。说是小区,北方生疏解,实际更像一个整饬的村落。每户一个小院,可种菜植花,篱笆门,红砖砌成平房两间,水泥铺地,墁粉涂墙。我俩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周宅。排栅而入,

一位老先生启门迎进。望之面色清癯,仪态雍穆。心想想必是周先生,寒暄之后,果如所料。屋内仅有简单的桌椅,我俩落座,见周先生不时用铁箸调理屋内的蜂窝煤炉。询知来意,稍事翻阅我们带来的第一位语言学副教授的材料,便道:“我不认识这个人,不了解他的水平。我也从来不做这种评审鉴定的事。南开有邢公(邢公畹,著名语言学家,教授,时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让邢公来讲。”

时隔四十年,周先生当时掷地有声的言谈犹历历在耳,齿齿难忘。他说完之后,气氛确实有些尴尬,我们也只得告辞离去。不过,老先生那种孤介清贞、傲然阅世的风神却深深地植入了我的脑际。

翌日,天气骤变,大风扬尘。白天,我俩冒着漫天的沙尘先后到和平里和劲松拜谒了两位专家,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日薄西山,风势未减,很快便暮色沉沉。我们又乘公交至玉渊潭附近新建的高层楼房拜访王利器先生。王先生是著名的古典文学专家兼文献学家,著作等身,曾在北大等多所高校任教。我经常翻阅他的《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早就期待亲聆警款。那时候的北京尚处于百度待兴的状况,还没有二环路,遑论三环、四环,九层以上的高楼寥寥无几。我们来到王先生所居的楼下,但见周边正大兴土木,数十辆铲车、大吊车在昏黄的路灯下轰轰作业,震耳欲聋。我们乘电梯至六层王宅,叩门而入。时王先生已年过七旬,退休居家,而精神矍铄,温润亲和。引我俩步入一书房,不过七八平米,四壁图书至顶,一套台湾版的《道藏》几乎占了一个面墙。他告诉我们:这是单位新分的房子,比以前大有改善,就是书多的没地方放。听说我俩是为了朱一玄先生晋升之事来京拜谒,十分高兴。说与朱先生弱冠即相识,且曾同窗,极力推荐朱先生之人品学问,认为早该升教授了。谈了半个多小时,我俩起身告辞。王先生执意送出,

我老家那里离梁山不远,是个出英雄好汉的地方,兴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老人家常说:为人不喝酒,难在世上走。听人说,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爷爷喝酒时,用筷子头蘸一点酒滴到我嘴里,辣得我咧嘴摇头。后来,当我长到6岁的时候,我第一次喝酒。那时候我父亲很年轻,在田集卫生所工作,很爱喝酒。一天,他和代销社的蔡伯伯喝酒,我正赶上,蔡伯伯说:让这小子也喝点。我父亲笑了,接着就给我倒了一杯。我端起来喝了。蔡伯伯说:这小子行!他夸我,我更来劲了,接着就一连喝了8杯。喝了酒兴奋。从蔡伯伯家出来时,遇一段残墙,我就来来回回地蹦起来。很多年之后,我父亲还啦我的笑话,说我喝了几盅酒,净蹦小墙头。

15岁那年,我上中学了。情窦初开,暗恋上一个年龄比我大很多的女子。很迷,神魂颠倒地老是想她。她在葫芦湾南边住。晚上,站在湾边上,可以看到她家后窗的灯光。大冬天的夜里,我常常望着她家的灯光痴痴出神……一天晚上,我父亲把我从湾边找回来,打开一瓶白干酒,干喝,一杯一杯又一杯,我喝了一瓶。黑甜一梦,一觉睡到第二天的中午。醒之后,我清醒了,冷静了,从暗恋中走了出来。现在想来,我还觉得挺神奇!我父亲是医

我见过的几位老先生

陶慕宁

却不乘电梯,沿阶步行而下,说是要锻炼身体。

此行最后遇见的一位专家是舒芜先生,地址在崇文门外的中帽胡同,距寒舍亦不远。我对那里非常熟悉,因为先父的好友,多尔衮的十一世孙金寄水先生家便在此巷。舒芜先生本名方管,学名方桂馥,字重禹。出自著名的安徽桐城世家,方氏文脉绵延数百年而不衰,故舒芜先生之学殖腹笥亦自不凡。我们循路找到巷内路北的一处小院,排栅而入。院子不大,四面平房,但不是四合院的格局。门窗都是新刷的红绿相间的油漆,很整洁,也很俗气。我们叩响西边的房门,一位身体微胖的先生笑容可掬,正是舒芜先生,迎我们进门。时方过午,但屋内阒黑,竟无一扇窗户取光,且进深不浅,看不到尽头,只能靠一盏昏黄的电灯视物。先生看到我俩拜访的表情,哈哈笑道:“这就是我住了好多年的房子,我给他起了个名,叫蜘蛛洞。”又指了指地上的几个大包袱,说:“我马上就要搬家了,这回是楼房,不用白天开灯了。”得知我们带来的是罗宗强先生的代表作及相关资料,对罗先生评价甚高,说是功底扎实,论证深湛,欣然同意晋升。我们在舒府逗留也不足一小时。

本文所记的四位老先生皆已谢世多年,且与我仅一面之交,为时亦短,只能聊述梗概,略同剪影。与我同行的李剑国教授,今也已年过八旬,著作等身,是享誉宇内的著名学者了。

第五位记王达津先生。与前几位不同,王先生是八十年代前期南开中文系的三位教授之一,一九八五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便忝然成了他的同事。我的导师宁宗一先生称他王达老。我们这些晚辈遂也如此尊称老先生。王达老籍贯通州,武汉大学毕业,又在西南联大唐兰先生门下读研究生,学富五车,才气横溢,他的文章既可写《尚书》《庄子》,又可论《金瓶梅》《红楼梦》,信笔挥洒,卓犖不群,而身形瘦小,道骨仙风。我的母亲也出身通州王氏,还

毕业于通州女子师范学校,不过据说祖籍是浙江山阴,与王达老究竟是否一个家族,不能确认。我当然更不敢借此攀附王达老。

记忆深刻的是两件事,一是一九八六年秋季,我当时很想学习老先生的授课经验,听说王达老在讲“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便于下午两点按时来到主楼阶梯教室。里面已坐了一百多人,但都是三四十岁貌似公务员的人,一看就不是南开大学的学生。我便在前排落座,为的是仔细观摩王达老的风采。很快,王达老按时入场,听众鼓掌。彼时老先生已七十高龄,衣着简朴,精神矍铄,坐于讲台后,从裤兜里掏出薄薄一册线装书,似是《昭明文选》中的一册,内有范晔的《狱中与诸甥侄书》,边看边讲。老先生的讲法似是自我陶醉于范晔之文,念一句说一句,全然是欣赏赞颂的声口。约半小时许,下面一位听者举手站起来说:“这个您上次讲过了。”老先生答曰:“哦?是这样?”听众都笑了。他便往下翻了几页,继续讲读。读到“吾书虽小小有意”一句,放下书,对众人说道:“吾书亦小小有意。你们谁想要我写的,可以告诉我,我给你写一幅。”大家都热烈鼓掌。讲到一处,老先生起身转向黑板,脚下一滑,险些仰面跌倒,下面不禁一阵惊悚。幸而无事,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衰”字,果然十分好看。

第二件事已经是十年后的春天,某日我在八里台校门口不期而遇,王达老看见我,便说:“你是陶慕宁吧。听说咱俩还是亲戚?”我只能唯唯寒暄,不敢确认。老先生忽然说道:“他们全错了。‘文不加点’就是‘文不加减’,既不加又不减,‘点’的意思是‘点’去,就是减去,根本不是文章不加标点的意思。”走出校门,便与老先生分手了。事后细忖,觉得王达老此说高屋建瓴,于训诂学大有裨益。

一九九七年我奉命客座韩国岭南大学,而王达老于是年取鹤西行。未能亲临丧礼,至今引为憾事。

喝酒

常跃强

常喝闷酒,借酒浇愁。两年后,我调到了省城,在山东青年报社工作。不久,我就得了胃病,先吃西药,后吃中药,终究也没有除根。有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王建国来了,我们报社的总编辑邹一夫设家宴请他吃饭,邀张炜和我作陪。酒喝到一半,我的胃就疼起来了。张炜细心,善观察,他问我怎么了,我说胃痛。他给我出了个主意:老常,你吃一副中药,一次把根给它除了!我听了张炜好心的建议,于是就到省中医院找吕同杰先生给我看。吕同杰先生大医,不光医道好,人也好,待病人如同家人。我吃他的中药,是越吃药越轻,最后吃到72副,哎呀,端起药碗就想吐。从那以后,我的胃病就好了。现在,我去中医院,一看到他的画像,我的感激与崇敬之情就会油然而起,仿佛他还活着,给我把脉,问病情,开药方……

亏了有个好胃,又能喝酒了。那时到下面去采访,他们都挺热情,那些劝酒的歌一套一套的,你不喝就觉得对不起人家的好意……

一年年下乡采访,我去了很多地方,喝了很多酒。我原来血糖低,后来喝成了血糖高,但我仍然没有戒酒,只是有了些节制,不那么任性了。50岁之后,我因病在家休养,一边养病,一边写作,真就成了“专业作家”了。为了清静,我到建设路那边去,那边的花园小区有我一套房子,我就跟上下班一样,天天躲到那里在电脑上敲稿。那个小屋里有个老周,周健,虽然当着处长,但他爱好文学。我们经常在一起啦啦,聊得高兴了,就到门外的那个酒店里去喝点儿酒。有一次我到他家约他出去喝酒,走之前,他先在肚皮上打了一针,我问他:你这是干什么?他说:打的胰岛素。我这才知道他的糖尿病比我严重多了。我劝他少喝酒,他漫不经心地应着,像是根本没有听到心里。五年后,我痔疮动手术,住院时,收到他的一条短信,说他身患小恙,正在治疗,很快就会好的。我回他说,我也在住院,待出院了去找他,我们好好啦啦。住了一个时期的院,出院之后就给他打电话。电话是他爱人接的,我问我找老周,他爱人说他去世了。我大惊,问怎么回事,他爱人就哭了,说他胸腔里积满了水,没救了……

放下手机,呆坐半日,我像一个傻

瓜一样喃喃自语:少喝酒!少喝酒!我命令你——少喝酒!

点之后我就很少喝酒了。有时候喝一点,也仅是三杯五杯的,从来不过量。再说,年纪大了,也喝不多了。前几年,心脏出了点问题,医生嘱我少喝酒,我一咬牙,索性戒了,心里说:这总行了吧!

我儿子出国12年,前年回来了,在一家高校任职。他除了去学校指导研究生,就是在家没完没了地写科研文章,心系着世界上那几家最大的科学杂志。累了,他就出去逛逛。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说他找到了一个原生态的好地方,还喋喋不休地说呀说的,我是这个耳朵听进去,另一个耳朵冒出来,根本就没有听到心里去。不过他说的这个地方我记住了,就是玉符河,我心里说坐地铁经常从河边过,也没见它哪里奇呀。去年秋天,他带我去玉符河,很近,只坐两站地铁就到了。沿着河边的一条路往东走,就见玉符河的水很少了,有的地方露出了河床,长满了芦苇。几只白鹭在小洲上漫不经心地踱步,偶尔也在水里啄几下,或者是飞到河边的大树上去。我儿子不停地拍照,说是拿回美国让女儿看看。继续往东走,就见路边上停着一辆客货两用的车,我心里说:人呢?往河里一看,只见一个穿着胶皮裤的中年男人从河里走了过来,到了车边脱了皮衣,才和我们说话。我问他:下河干什么去了?他说下网捉鱼。我说,有鱼吗?他说这一网下去,三天的酒就有了。一炸,那个香!再喝点小酒,神仙呀……我对他的这种日子赞叹不已,十分羡慕,随口就念了杨万里的一首诗:人间那个个山川,船上渔郎便是仙。远岭外头江尽处,问渠何许洞中天。

中午回到家,见桌上摆了一桌子菜,还有一瓶好酒。妻子说:儿子打电话说,人家站旁边,报着嘴,说:你不是羡慕人家吗?这不,来了……喝吧!我有些激动,手颤抖着打开瓶盖,瞬间扑来一股酒香,我深深吸了鼻息,也算是喝了。接着我把盖子拧上,叹了口气,说:没福了,把杜康放心里吧!



南宋佚名《春溪水族图》局部(现藏故宫博物院)



“文汇报会”
微信公众号